

空間與權力——「合歡山」的文化地景解析

金尙德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

台灣是一座總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太平洋小島，在世界地圖中，並不算特別起眼；但是這麼一座蕞爾小島上，卻擁有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峰二百餘座。使得位處於亞熱帶的島嶼之上，卻也難得地，同時兼備了寒帶的罕見地理環境。但是這些高峰，卻是個個幽閉藏身於崇山峻嶺之間、與渺無人跡之境，唯獨「合歡山」這座中央山脈上的高峰，因著道路交通的近身，成了人們唯一易於親近的「文明化高山」。在早期台灣尚未開放出國觀光前，在這亞熱帶的海島上，對於嚮往白雪皚皚的北國雪景，且又不具雪地登山能力的一般人而言，合歡山無疑是最佳的賞雪景點了。

在一般人的印中，合歡山區是個適合大眾賞雪的風景區，合歡山主峰更只是座中橫公路旁，驅車得以直達的山峰。然而，合歡山卻是座不折不扣的高山，而在它「文明化」的過程中，卻也備具歷史意義。

在近代社會的集體記憶中，這座高山如此平易近人的根基，除了直接源自於中橫公路艱辛開發的貢獻；在「合歡」的浪漫修辭想像之下，伴隨著戰後台灣社會經濟蓬勃發展，人民所得提高後的旅遊興起下，這個觀光名勝所呈現的歡樂圖象。今日，若我們欲瞭解「合歡山」的所在，可以依循著地圖的指引，而在中央山脈特定經緯之間，一座海拔 3416 公尺的峰頂之上，得以輕易的指認出這座山；過程與結果毫無疑問地，沒有人懷疑這樣的地理「常識」與「事實」。自古以來，紀錄描述這個地理名詞，起初僅偶見於清治初葉以後的史冊方志；然而，同樣的地理名詞卻大量的縱橫貫穿於整個日本治台期間，在日治初期的地理探勘、戰爭、理蕃，與末期的國民精神總動員下的青年鍊成活動等重要的殖民史程碑上；「合歡山」皆然未曾缺席地不斷出現，終被世人所熟悉，進而成為社會對於此一地理空間的基礎知識。

然則從後殖民的解析中，關於它的出現，探尋、與「再現」此一傳說地理空間的過程，與當時山下社會的變遷關係究竟如何？它如何被命定、並透過了社會建構，以形塑為今日我們所熟悉的「合歡山」此一地景？而當我們從知識與權力的角度來理解，而欲加探討的是；關於這個地理「常識」，今日已然認知的「事實」與「知識」，它等是否同於「真理」？這樣的知識如何產出、傳播與複製？隱身在「合歡」的社會記憶、與漢文字意的浪漫修辭之下的，除了它外在的文明化高山形象外；在美麗的自然地景背之後，它是否也交織著文化意涵與社會權力的鑲嵌關係？

合歡桃源、蘊奧莫悉——想像的文化地景

對於「山」這樣的自然景觀，在中國的定耕農業文化之下，向來就不是主流的生產空間；正因山地的地理特性欠缺了水田文化下的特定生產條件，因而難以從事經濟性的社會生產，連帶造就了傳統主流社會中對於山地「知識¹」的欠缺。

也正因為社會意識上「無法」（這是客觀²條件）從事生產、卻相形對照於束縛在四季農忙之外、而自居於「無須」（這是主觀意識）生產，也卻能自得之境界者，便投射出了無須依賴物質基礎的，眾神的桃源仙界、抑或隱士的修行道場。因著中國傳統社會的下層建築中的生產條件，使得「山」超脫出了社會的經濟物質基礎，而進入於庶民日常生活之上的眺望與想像、意識與哲學的上層境界。復經各朝歷代，特別是唐宋以來大量詩詞歌賦的文本推波助瀾與交互作用，終於營造建構出「山」之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特殊地景意涵。

1684 年清軍登陸台灣，鄭氏王朝隨即傾覆。佔領臺灣之初，受於清帝國的國力有限，對於這個充斥著番人與瘴癘的海上孤島，清帝國原有主張撤民棄島之議，然而在福建水師提督施琅上疏力陳之下，翌年將臺灣納入帝國版圖；並設立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

然而，在當時的漢人以府城為中心，聚落則散佈於臺灣西部平原地帶；而這些聚落與城郭之外，就是一片人跡罕至與未知的「番界」，其中尤以廣大的山地更為之惶然恐懼。這群甫到帝國邊陲孤懸海島的朝廷命官，相形於中國內地沒有「番害」的山地，此間的「化外之山」，相形對照之下大相逕庭，其感受也溢於文表：

深山之中，人迹罕至。其間人形獸面、鳥喙鳥嘴、鹿豕猴獐，涵淹卵育；魑魅魍魎，山妖水怪，亦時出沒焉……然在層巒疊嶂之內，山外係化外野番巢穴，番獐路險，人踪罕到，亦不知山在何處，與山之高大幾何也（蔣毓英，1993：13）。

台灣崇山峻嶺、混沌未知的群山之中，也包含了一座名為「合歡」的山峰。歷史上名為「合歡山³」的山峰，首次出現於文獻，便是 1685 年首任臺灣府知府蔣毓英主修的《臺灣府志》（1993）。在這本描述了此一初入大清版圖之海上疆域的方治上，於其〈敘山〉一章，有著一段極為簡短而不甚起眼的，如下的描述：

南日山在崩山社界，小龜崙山西，中港在此山北發源……合歡山在南日山西，此山出灘，流入淡水港。又北而鷄籠鼻頭山（蔣毓英，1993：20）。

這是文獻中首度關於「合歡山」的描述；然而在當時，遠離於漢人社會聚集與經濟生產的西部平原地帶之際的合歡山一詞，除了作為一種概念性的地域疆界

¹ 這裡所指的「知識」，係就主流社會而言；並非指稱當地的「民間知識」、「地方知識」。

² 這是水田定耕文化社會所看待的生產條件。

³ 清代文獻上出現的「合歡山」，不等同於今日確立定位的「合歡山」。

宣稱之外，完全不具備什麼特別的社會意涵。尚且，文中所指涉的區域十分遼闊，僅能略知此山的位置約在南起於今日大甲（崩山社）、北迄八里（淡水港）之間，縱括整座雪山山脈的廣大山區，也幾佔盡當時諸羅全縣的界境；雖不明所指為何，但卻與今日我們所認知的「合歡山」不僅所屬山系截然不同⁴、其地理位置也相距甚遙。

到了 1717 年的《諸羅縣志》，也為作為縣境諸山之一的合歡山，紀載了同樣簡短的描述：「合歡大山遙接乎干豆門諸社者為查內山，山麓有查內社……中港溪發源於合歡大山」（1717：98）。在《諸羅縣志》中，合歡山僅作為陪襯另一座「查內山」（約在今日中壢與大溪之間）的附屬描述；並提及了該山為中港溪的發源地。隻言片語中，雖較之《臺灣府志》並未提供更多的參考資訊，但其附圖卻以概念式地圖，首度提供了關於合歡山最初的地理風貌描繪。雖然當時的中國早已於 1708 年由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進行以西方科學的三角測量、及運用投影法展開繪製包含臺灣在內的《皇輿全覽圖》，但此一科學技術顯然並未在當時發生足夠的影響力。一如典型的中國山水畫式地圖，方志中的附圖以現實地理條件中並不存在的視覺想像角度俯瞰西部。雖然圖像中各地景的位置、比例、地理形象，多係出自於想像；卻也約略指出了，當時所稱的「合歡山」位於中港、竹塹兩溪東方山區的相對資訊，補充了《臺灣府志》所提供的地景描述，而得以更為聚焦。

此外，1737 年的《福建通志臺灣府》則標示了各山與淡水廳廳治的里程距離：「距廳治東南……六十里為貓里山、合歡山，七十里為交眉山，生番居之」（陳壽祺，1960）。而後，《重修臺灣府志》（1745 年）的記載約略相同，其附圖〈淡水廳圖〉則描繪指出合歡山位於淡防廳（新竹）以東的山區。而 1762 年的〈乾隆中葉臺灣軍備圖〉（洪英聖，2002），則較之府志與縣志的指向略微偏南，約在後壠以南的打馬八溪（今稱苗栗西湖溪）以東的位置描繪了合歡山。

除了官方方志的記載，民間的詩賦中，也開始出現關於合歡山的地景入詩，例如 1763 年的〈臺灣形勝賦〉：「陟北山，窮極浦；五步練奇，三臺擎柱。交眉列翠而容與，合歡舒顏而媚嫵」（卓肇昌，1989：489）。文中描述的當時，時序已屆清國領臺 80 載，雖然漢人開墾漸北，但竹苗一帶（「三臺山」為今日苗栗境內的加裡山⁵）仍是墾界的極北之地；作者履及於此，眺望並詠讚包含合歡在列的遠山奇媚風光。算得上是對於當時所謂的「化外之地」難能可貴的正面地景描寫。

從上述清代官方的主要地理方志、以及民間歌賦中，都可以看到關於這座「合歡山」的描述與描繪，皆然來自於雪山山脈西麓，當時受漢人開拓有限的竹苗一帶平原地帶。受限於當時清帝國的國家權力與科學技術的力有未逮，除了少數擁有獨特形貌，而得以遙指而無誤的奇特山峰⁶之外，皆難以透過符合嚴謹的科學

⁴ 文中的描述，係指向於竹苗以東，雪山山脈的西側山峰；今日所稱的「合歡山」則位於中央山脈的位置。

⁵ 參見苗栗知縣沈茂蔭著《苗栗縣志》：「三臺山，俗名嘉禧山」（沈茂蔭，1993：22）。

⁶ 諸如今日新竹地區可以平原通視的大霸尖山，因為造型奇特，自古就有「酒桶山」的古稱；

基礎，而據以成為地理標示與定位；尚且一部縱覽全府、全縣的方志，不僅其修纂者是否曾經親身走訪考據、抑或僅憑道聽途說，抑或延續抄襲前著文獻的謬誤，也必然造成了描述繪上的誤差。雖然他們都指出了之於清代有此一「雪山山脈上的合歡山」，然而歸納這些曾經出現的描述；卻由苗栗、竹塹、西湖等台灣西北部山麓間遊走，除了與今日我們所熟悉認知中，較更深遠、且在南方百餘里外的「中央山脈上的合歡山」不僅地理南轅北轍、形勢更有天淵之別。對於這麼一座所謂「疆域」內的高山，事實上卻是文人騷客的藉景抒情與憑空臆測，因而成為了「一個合歡、各自表述；多樣文本、卻不知所云」的模糊與流動；究竟所謂的「合歡山」所指為何？終究如霧裡看山、莫衷一是。

而關於「合歡山」山名的由來，清代各時期的方志均未見有特別的記載，甚至於日本領台後，諸如伊能嘉矩、安倍明義等學者的地名研究論著，也未見對該山的考證⁷。雖然並無直接的文獻指出合歡山名的由來，但我們仍可從文獻中瞭解當時的社會文化如何影響自然地景，賦予地景被觀看與想像的面貌；再藉由這樣的社會脈絡之中，嘗試瞭解理解「合歡山」山名的起源。

伊能嘉矩考察台灣複雜的地名變遷，在《大日本地名辭書》（1909：5-9）中，將臺灣地名考證作了整理歸納，依臺灣地名的由來，作了如下的區分：

一、地名起因

- 1.以自然的一般形勢位置命名
- 2.以自然的特殊地勢形容為名
- 3.當地生產的特殊天然產物
- 4.山川勝蹟及建造物
- 5.歷史的沿革與古來傳說
- 6.開拓及建置
- 7.開拓及建置選擇吉祥佳字
- 8.移民的原居地名
- 9.因歷史事件而更改地名

二、地名轉訛

- 1.漢族以外的語音為地名
- 2.舊有的地名更其音以接近吉祥佳字
- 3.故意轉訛語音為接近文字語詞
- 4.舊地名加添文字成為新地名
- 5.將既有的地名合併省略成為新地名

故縱使無科學測量的基礎，亦能古今對照指稱無誤。見《新竹縣采訪冊》：「熬酒桶山在縣東南百餘里，旗山從淡水縣番界中東南方來，在諸山之上突起一峰，頂平而圓上稍窄而下漸寬，形如熬酒桶，高插雲霄，為人跡不到之區」（無作者，1993）。

⁷ 關於清代「合歡」一詞在文獻記載的分析上，王幼華（2006）的〈合番或者合歡〉一文，是目前最為完整的分析與綜合論述，文中考證指出「合番」與「合歡」兩詞的同意；歸納在清文獻中出現於番社名、山名、地名、族群名與人名；並指出了「合歡」一詞應源出道卡斯族族語。

6. 同一個地名有數種假借的字音

分析伊能所歸納地名起因的兩大類系譜，其一為受社會文化認知而賦予的意義、其二為受語音轉訛變化而來的指稱；前者顯然多屬於發生在漢人已開拓與久居的社會之中，因而藉由文化推動自然地景的改造，建構成為官方及社會聚焦的「主要」的文化地景；而在城郭聚落之外的廣大地域，其地名由來則多出於伊能所歸類的後者，意即以番語為主的文化要素，所形塑出附屬與參照性質的「次要」地景。我們再藉由清代的文獻中，針對山地命名的由來進一步認識：

1706 年，臺灣同知孫元衡在《赤嵌集》，有段有趣卻寫實的寫照：

林下學占爭喚鳥：蕃人聞鳥語而知吉凶。

檻邊閒譯最深山：臺山無正名，都從彝語譯出（孫元衡，1958：28）。

自將臺灣收入帝國版圖以來的官方消極態度，可藉此一覽無遺。對於朝廷高級命官之於轄下「封域」的城外地區、與其相關之地理知識竟也僅落得「檻邊『閒』譯」的消閒逸趣。1722 年，巡臺御史黃叔璥所著《臺海使槎錄》亦云「臺地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黃叔璥，1989）。可以窺知，除了在廣大人跡罕至的區域上，以番語轉譯為地名；在更為深遠的高山地帶，實務上也同樣採用了最為便利的作法，即是直接援用與其地理位置相對的番社之名，為山命名：「淡地⁸諸山本無正名，皆從番語譯出。每以所隸堡、社稱之」（陳培桂，1989）。

據此觀之，我們再將合歡山在地圖上的相關諸社相互對照，援引 1722 年《臺海使槎錄》中〈番俗六考〉一章中的「北路諸羅番」記述：

北路諸羅番九：崩山八社（大甲東社、大甲西社、宛里、南日、貓孟、房裏、雙寮、吞霄）、後壠、新港仔、貓裏、加志閣、中港仔（以上四社俱附後壠納餉）、竹塹、礁礮巴（黃叔璥，1989：308）。

文中所謂之北路諸羅番，即為日治時期後，由日後伊能嘉矩所稱的「道卡斯族」平埔族原住民；其傳統領域正分佈於新竹、苗栗至台中附近的西部平原地帶。而文中所載的各部落社名⁹，多被各時期的方志作者，用以作為命名周邊相關山峰的指稱。可見於各式描繪「合歡山」一帶地景的山地地圖；諸如：蓬山社（蓬山；見府志、重修府志圖）、宛裏社（宛里山；見重修府志圖）、南日社（南日山；見府志、縣志、重修府志圖）、貓孟社（貓孟山；見縣志、重修府志圖）、貓裏社（貓裏山；見縣志、重修府志圖）、加志閣社（加志閣社山；見縣志圖）；以及次章所述之眩眩社（眩眩山，見縣志圖）等，皆係採集道卡斯族之社名為「合歡山」周邊的山峰命名。

而在《重修臺灣府志》所附〈淡水廳圖〉所指稱的「合歡山」東方深處，則另有一座標示為「南日山」的山峰；我們可藉由〈諸羅外紀〉的記載，來進一步

⁸ 即淡水廳轄地，當時為中部大甲溪以北，至雞籠為界。

⁹ 關於道卡斯平埔族的部份社名，甚至已出現於更早荷蘭時期的番戶戶口記載，可參見 1664 年《巴達維亞城日記》。

理解「合歡山」與道卡斯族的地理與族群關係：

南日諸山之後，有巨石峭削巍峨，出內山之頂，或名之曰冠石。土番¹⁰云：「後壠、竹塹諸社指石為的，登絕頂東洋及山後諸社可一望而盡，亦有捷徑可通，但奇險耳（陳夢林，1992：409）。

若參照〈淡水廳圖〉所描繪的相對位置，此段記敘意味著當時平埔族道卡斯族的後壠、竹塹社之勢力範圍，在當時尚可到達較之「合歡山」益加深遠的東方、意即南日山的山後。因此，地理位置相對於「南日山」更接近平原山麓的「合歡山」，自應亦屬於道卡斯族可能的傳統領域與活動空間。

從清文獻與日後伊能的研究中，可歸結出「山本無名、番語譯出」應為當時描繪山景的普遍現象、與製圖上的方法；從清領翌年《府志》的編撰中即出現「合歡山」之名，而當時漢人的墾拓尚未大舉北拓之前，漢民眼中荒蕪化外、生番盤踞的地景名稱，自應在主、客觀條件上均無需因為配合地理調查，而隨之將地名漢化、或更名易詞的可能；「合歡」這個看似漢化的名稱，實應為當時土番的語彙，故能於官方首部方志編撰之初即受到採集入錄。此外，加以考證周邊諸山，山名多採用居住於此的道卡斯族土番語而來，以及相關地理位置含括於該族群可能的傳統領域之上；皆可以據以為論，清代當時方志中所謂的「合歡山」一詞，應係源出於當地道卡斯平埔族的族語語彙。

由官方方志的「轄治封域」之中，竟也明白昭示「生番所居」的弔詭情境。方志地圖將視覺的焦點集中於某些特定的聚落地景上，並且提供了醒目的位置與誇飾的比例；而廣大的山林地帶徒然只是個襯托城郭的被參照對象。換言之，所謂的「封域」，實則並未存在於國家實體的邊界之上，而只是個想像的疆界。藉由文本圖像所投射出的意象，不僅說明了對於當時地理空間的理解、與觀看府縣治的凝視焦點，僅然聚焦於城郭圈內；同時也投射出了地圖背後當時的權力關係。清代對於臺灣地景的描寫，除了受到前述其經濟基礎的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中，生產模式與生產關係（平地農業）的影響；因而造就了上層建築（*super structure*）中對於山林地景的意識，只是個可遠觀而無需狎近的歌詠對象。伴隨著當時清帝國整體對於臺灣的消極作為，連帶使得派任來臺三五年一任的朝廷命官，期盼相安無事、只待調昇內地的過渡心態。因而國家權力的邊界，某種程度的被允許在相當的模糊與彈性之下，以彼此維繫著一定的平衡關係。

在這樣的整體社會氛圍之下，「合歡山」縱有其名，然而其內涵如何？實則並非當時的社會所關心。換言之，在當時的國家權力脈絡、與科學技術的背景之下，這樣混沌的台灣山地，雖屬「應然」的大清封域；但「實然」並未造成什麼樣的社會缺憾、亦或有礙於將之到來的權力企圖；對於一個想像的疆域、與遙遠的地景而言，如此的空間知識與意涵，已然足夠。遙指山嶺、寓意為志，是一個文化地景的建構過程；只是源自於山下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條件，已然決定了人們觀看山上地景的眼界視角。

¹⁰ 清代所指稱的平埔族。

武裝探險、完成初登——殖民的文化地景

隨著馬關條約結束了中日甲午戰爭、以及清廷在臺兩百餘年的統治權；1895年，臺灣進入了日本帝國的領治時期。有別於清廷的消極態度，日本政府急於將這塊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有效經營與開發。於是，在弭平了各地台民反抗勢力後，逐漸建立起行政架構，並開始運行施政。值此時，全島唯一尚未納入國家體制的，便僅剩下廣大、且少為外人所悉的山地地區。而對於台灣廣大山區地理環境的瞭解，依然十分有限；神秘的高山地域，實質上仍未納於帝國疆域；深山的探險，往往也是以失敗收場。

1896年，台灣總督府軍務局預備籌組中央山脈探險隊，計畫以五條路線探險台灣這塊帝國新領地的心臟地帶。翌年，由軍務局陸軍大尉深堀安一郎率領的探險隊由台北出發，藉道埔里、溯經眉溪進入山區，計畫翻越臺灣三千公尺的分水嶺¹¹；再循著木瓜溪東出花蓮港；橫貫當時地理條件狀況不明下的台灣山地，並進行臺灣橫貫鐵道路線的調查之舉。深堀一行在隆冬雪期依計畫進行探涉與測量；最終，在發出了「預定攀登三千公尺分水嶺」的最後信息後，便命喪於生蕃之手，消失在廣大的深山祕境之中。

深堀事件震驚了總督府，迫使帝國對於山地的偵察活動暫時宣告終止，也對於台灣山地更增添了神秘想像。1906年，佐久間左馬太繼任第五任台灣總督，其到任後便急於打破這種「領而未治」的局面，後隨即著手規劃「五年理蕃」計劃，於1907年首先於「北蕃」為主的區域內，延續清國的隘勇策略，延長並構築新的隘勇線，並逐步勸誘「蕃人」移入線內的「甘諾」政策；以壓制北蕃、撫育南蕃的治理策略同步進行。

隨著隘勇線的擴張，帝國勢力逐步進逼，並漸次縮小封鎖圈；由於生計包圍的策略奏效，在南投一帶，霧社群被迫於1906年向日本歸順，1908年總督府將隘勇線由霧社向上擴展至濁水溪上游的「三角峰」，並設立了隘勇分遣所。至1909年土魯閣群、陶賽群也都相繼歸順；至此北蕃中居住在濁水溪上游的三群（今稱「賽德克族」）全被征服。而總督府的隘勇線也直逼中央山脈主脊，於海拔兩千餘公尺設立了櫻峰隘勇分遣所。伴隨著殖民侵略的腳步，這個時期正是臺灣山地的地理探勘最為活躍的時期，許多清代無法到達或未知的地理空間，都被精準的科學測度丈量得透裡徹外；各種精度的地形圖，也陸續完成製版繪圖；逐地、逐張的不斷生產出來。

如同山下政權的更替，山川地名的轉寫與再現的巨大工程，也正如火如荼的在全臺開展之際；在此同時，「合歡山」這個清代飄移不定的地理名詞，卻也悄悄的再次出現。當1909年4月，在被隘勇線漸次包圍的土魯閣群要求歸順之時，日方藉勢開出了和解的條件；其中之一，便是要求蕃人協助推進隘線路，直達更為深遠的中央山脈之上。而這個記載於官方文書上的中央山脈指稱之地，正是「合

¹¹ 深堀大尉所回報的「分水嶺」，即為今日所稱的中央山脈，奇萊山與合歡山之間鞍部。

歡山」(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97a: 567)。

從清代以來虛無飄渺般的合歡山,再度的被世人提及,卻已經是以一個「真實」的面貌問世。對於這個繼承自前朝地理名詞的「真實」出現、與「事實」宣稱的轉換過程,卻並未見有其充分的科學根據;唯一的「科學」證據應為臺灣輿圖(1880)與劉銘傳的臺灣蕃地圖(1890)等「晚清輿圖」的描繪(將合歡山描繪於臺灣中央主脊地帶)。而合歡山為何從竹苗雪山山麓被位移、放置至中央地帶,是錯置、誤植?已全然不可考;抑或其實晚清輿圖並非刻意將合歡山描繪於今日所知之「中央山脈」(當時尚未有「中央山脈」、「雪山山脈」分立的觀念,係至日本治台後才獲得證實¹²),而僅係為了表達出「更深遠的內山」之意?其理由,正因為該「合歡山」與竹苗平原完全無法通視,蓋不可能為清初方志所描繪之地景,亦不可能於清末製圖所觀測之實際位置。在無法進入山區實測的限制之下,採分別由東西兩側描繪,便成為了「中央」山脈的錯覺?

無論如何,此間的地理狀況有待實地踏查。翌年雪融,總督府蕃務總署測量技師野呂寧便迫不及待,展開首次的合歡山登山探險作業。1910年2月,野呂寧與財津技手協同警察隘勇等五十餘人,由埔里經霧社、三角峰並抵達最深入中央山脈的櫻峰分遣所。隨後數日間,在天候不佳、嚮導蕃人陸續逃散,及寒流降至冰點的連串厄運狀況下;僅登上了合歡山南側的平寬山峰:「合歡山南峰」(由野呂寧當場命名),便倉促下撤結束探勘。這是首度的「合歡山」探險。雖然未登上「合歡山」一探究竟,但首度探險歸來後的野呂寧,將探險的過程發表在1910年3月13日〈漢文版臺灣時報〉的「踏查合歡山」一文中:

本島中央山脈中有一峰,曰合歡山。夙為世人所知,未曾有實地踏查者,故莫悉蘊奧。

在簡短的開場文中,可以證實野呂寧所指稱的合歡山,正是清代方志詩詞中不斷出現的「合歡山」(位於竹苗);野呂寧將清代以來的合歡山,轉換成為其所尋獲並定義的合歡山(位於南投)。在未曾有人屢及的前朝遺憾中、隱喻其數百年間被世人尋找、而在當代實踐的過程;並且傳達指引出了合歡山曾為蕃人盤踞的社會記憶。

首度探險的失敗,並未擊垮這位總督府首席測量技師的意志,在事隔僅十數日之後便捲土重來。一行人在原地等待氣候轉晴,探險隊再度自櫻峰分遣所出發,當天先宿營於南峰下等候霧散;3月16日清晨,天候再度放晴,先重新登上合歡山南峰後,繼之順利登上海拔三千四百餘公尺的合歡山頂。旋即在兩度遭到槍襲的緊張氣氛之中,倉促進行初步的觀測,並北進至白狗隘勇監督所(臺灣日日新報, 1910a、1910b)。這是外人首度登上合歡山的實地踏查,而此次測量總測量面積僅達18平方日里(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97b: 151)。

¹² 1910年,宜蘭廳叭哩沙支廳長小島仁三郎等人,由攀登南湖大山的途中觀察,才證實了次高山(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原來分屬不同山脈(沼井鐵太郎, 1997: 40)的地理現象。而次高山山麓的諸山探勘,更是遲至五年理蕃戰事告一段落後的1915年方才完成。

野呂寧以三角測量與經緯儀，為日後並延續至今日的「合歡山」下了科學的正式的定論；即延續至今日我們所認識的合歡山，其便是出於野呂寧當時所標示定義：

合歡山位於南投廳內，西部隘勇線櫻峰分遣所東方九公里半處，是一座聳立於中央山脈主脊上的高山，海拔一一、二〇〇尺¹³（楊南郡，2002：250）。

這是一個首度以科學技術探勘「合歡山」的地理踏查過程。自清代以來，文獻所記載的謎樣地理空間，已在此時為總督府技術幕僚「證實」與「再現」；由飄移的想像論述，轉換為腳下的山頭；從自由的流動文本，定位在地圖的表面。並未有人懷疑此一宣稱憑藉的證據為何；但這個「宿為世人所知」的山峰，就此終告塵埃落定，所憑藉的是帝國權力所成就的殖民探險；因而在這個「未曾有實地踏查者」而被命定的山頭空間上；藉由知識宣稱所建構的權威論述，而將兩百餘年來遊移不定的合歡山定於一尊。

在此同時，由於甘諾政策係延續自清代以來一貫以封鎖圍堵的思維，但在實施不久後，卻使得蕃人與平山交界地帶的客家族群俱感威脅，因而同時引發了抗爭而宣告失敗。1910 年總督府重新檢討並再度規劃「五年理蕃」計畫，確立了武力強制打開山地禁域的政策方向，改以結合軍警武裝討伐為重點，將殖民的力量，深入領台十餘載後，仍處於帝國勢力邊陲的山地地區。

1913 年，時值佐久間總督「五年理蕃」計畫下「太魯閣蕃討伐」軍事行動的前一年，戰事正如野火燎原般的遍掃整個台灣北部山區，總督府挾強大軍事武力而順利地陸續降服以「北蕃」泰雅各族群為主的山地地區。是年秋天，侵略的腳步正如預期般地，來到了最後一站的太魯閣人所在地。值此時，合歡山雖已完成首次的登頂，但也由於在山頂上遇襲，而僅在倉促中僅進行了初步的測量；由於軍事行動在即，總督府亟欲瞭解內太魯閣山區的地理環境及各部落位置，為預定於來年展開的討伐行動評估適當的進軍路線，因而仍持續組隊進行合歡山的探勘。

隨後的數次武裝探險，卻出現了極大的戲劇性發展。其中以 1913 年 3 月，野呂寧率 286 名探險隊員，在合歡山遭遇風雪，而造成 89 名隊員死亡的「合歡山遭難事件」，成為台灣史上「最大的山難事件」（引自楊南郡，2002：263），最為引人注目¹⁴；以及同年 10 月，佐久間總督所親自參與的一支由陸軍武裝士兵護衛¹⁵、共計三百餘人所組成的探險隊，也成功地登上了合歡山頂，並在晴朗的天候狀況下，順利、且完整的完成立霧溪上游的地形測繪作業。

隨著地理測量的完竣，1914 年 5 月，合歡山上旌旗幡飛、軍隊陣列；數千

¹³ 此處的尺，乃係指「日尺」。1 日尺等於 0.30303 公尺。

¹⁴ 關於此一山難事件的完整過程，請參閱楊南郡（2002：250-65）。

¹⁵ 先前的探險測量，皆以警察本署派遣警力護衛。整個五年理蕃的軍事行動，初期僅投入警察的武裝力量，在遭逢預期外的巨大反抗力量後，總督府更將軍隊的正規軍力投入，形成了軍警聯合討伐的局面。

軍民紮營安寨的景象，不尋常的出現在台灣海拔三千公尺高山上，成為台灣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浩大戰爭景觀¹⁶。合歡山成為「討伐」軍隊的根據地，「太魯閣蕃討伐」的戰火由此蔓延開來。至此，也正揭示了，關於「合歡山」地理位置的確認與標示的企圖，卻也不折不扣的，正是基於這場殖民戰爭需要、與帝國權力目的之下而誕生的產物。

「山」本是無名的，「命名」的本質就是一個社會建構寓於地景的過程；而「製圖」則是知識與權力的結合、實踐霸權於空間的體現。源自清、日國家政權更迭後的社會需求不同，決定了觀看與理解「合歡山」的方式：前者是對於番人盤踞下想像封域中的描述與抒發；而後者則是開發皇土與殖民治理下的測量與征服的必然之舉。然而，弔詭的卻是空間轉換上的移位過程，由雪山山麓轉向中央山脈深處的過程與資訊的取舍；真只是個單純的地名轉寫、抑或是文化地景的刻意建構？

由文獻的定義而言，僅由清代的數篇方志、與前後不一的輿圖，如此薄弱的參考文本，如何能定論、又為何非再現文本中的合歡山？既然這是一個「未有人踏查之地」，大可對於所謂的「無主之地」，隨著帝國的逐一佔領而給予新的命名，成為新的地理景觀（此間，絕大多數均以「地理形象」抑或「自然地景」來指稱；諸如霧社以東至中央山脈主脊沿途一帶的三角峰、櫻峰、鳶峰、三角形峰[奇萊山]，以及以東的塔山、三角錐山等）；何故需要移植一座文本上的高山？

再從地理實景而言，由清代漢民生活的西部平原，望向崇巒疊嶂的中央山脈，視線將被橫亙障列的雪山山脈所阻擋。而野呂寧所命定的「合歡山」（海拔3416公尺），卻是身處在平均高度更甚之3500-3800公尺的雪山山脈背後、與益加遙遠的中央山脈深處中，一座不起眼、且相對低矮了的數百公尺的無名山峰；尚不考量地表弧形、與遠距；由平地視覺上的互覷，僅是障列於前的雪山山脈就足以阻斷通視；然而，這是身為總督府地理測量專業技師的野呂寧必然深知的。

總督府塗銷了清代文本中「合歡山」的模糊與矛盾之處，卻藉由合歡山「存在」的客觀事實、與客觀的文獻記載；對照出被「尋獲」此一空間的應然之實。並以此召喚出社會的集體記憶：意即「合歡山」在前朝記憶中所象徵的番界、與遙遠未知地理空間的意象；在這個海拔3416公尺之處，再現了文本中「生番盤踞」想像空間的馴化，並合理化了殖民理蕃企圖的正當性。從飄忽不定的詩詞歌賦中，尋找一個科學上的「點」，並將之寫入了特定的地理空間；其過程宛如尋獲作家筆下「香格里拉」或「烏托邦」的宣稱。地圖背後隱而未顯的權力關係是什麼、地景背後未言而喻的社會意義又是什麼？抽象的概念需要一個以物質為基礎的象徵符號，將之投射、並具象的再現媒介物。這個經由創造又經由地理技術官僚「證實」的合歡山，終究成為了帝國地理功業的象徵地景，與被安放在中央山脈之上、理蕃事業的巨大紀念碑。

我們以此歸結：「地圖先於空間現實而存在，而非空間現實先於地圖存在。換言之，地圖是為它聲稱要代表的事物提供了模型，而非那些事物本身的模型」

¹⁶ 也同樣是日本軍事史上絕無僅有的。

(Anderson, 1999: 192)。在想像的空間，與再現的地圖之間；藉著尋獲古老的遙遠空間，卻寓意著當代所成就的地理功業。無論時間之於清代或日治，社會建構的凝視、與隱身於在科學技藝背後的權力運作，才是圖面最終的支配者。

紀律之身、馴化之地——規訓的文化地景

自太魯閣討伐結束後，合歡山的鄰近周邊雖已建設開鑿了網絡狀的理蕃道路，但合歡山仍是座一般人仍無法親近的高山。除了少數的調查研究與公務登山活動，而需進入此山區之外；「登山」在這個時代與地域間，仍是個不切實際的活動。合歡山的登山道路，雖有昔日戰爭後遺留的清楚路徑可以利用，但卻仍需要警察護衛來進行登山（沼井鐵太郎，1997：114）；非公務的登山者更需支付護衛費。原因係中央山脈東西兩側的蕃人（賽德克與太魯閣族）仍處於敵對的狀態；以及對其他外來者的零星衝突也仍時有所聞。在 1929 年攀登合歡山的紀錄上，仍有動員警察護衛，並且事前規範攀登合歡山期間雙方蕃人禁止借槍狩獵的緊張狀況；並得巧心安排、隔離雙方在確保不會相遇的情況下，接替挑夫任務（沼井鐵太郎，1997：131）。1930 年霧社事件爆發後，隨之而來的「集團移住」政策的實施，使得世居當地的原住民，相繼被迫離開傳統領域而移居下山；逐漸淨空的山區與喪失了原有的功能的理蕃道路，卻也意外造就出有利於登山的條件，使得山地攬勝與登山運動在此發展開來。

隨著總督府陸續完成對於山地與原住民的控制，霧社事件平息後，民間團體於是開始積極宣傳台灣山嶽之美，因而興起一陣體驗山岳美景的健行探勝風潮。於是，橫貫穿越合歡山山地的「合歡越」道路，就在這樣的需求下誕生了。1935 年「合歡越」道路開通；「合歡越」西起台中州霧社，翻越合歡山區，東迄於太魯閣峽口，道路全程二十六・五日里，大抵沿用昔日理蕃道路，依傍立霧溪畔開築為人行山道。一般健行者約五至六日步程，便可完成越嶺抵達花蓮港廳。「合歡越」道路以豐富的史蹟，與山岳、斷崖、峽谷之美為其代表性。立刻受到了當時社會的重視。在早已先期完工通車的臨海道路（今蘇花公路）配合之下，吸引了絡繹不絕的探勝者；並由於道路就在合歡山麓南側橫越而過，從步道上起登，僅需頃刻便可以登上合歡山絕頂；相較於先前的探險測量時期，宛如天淵之別。文明的腳步完全征服了這座原本難以親近的高山¹⁷。

來自台灣全島及日本慕名而至的攬勝者，絡繹不絕地遠道而來，健行於「合歡越」；並取道登上這座赫赫有名的合歡山。一般的行程，多僅止於東西端的太魯閣峽口與霧社一帶，全程橫斷中央山脈並登合歡山的隊伍，則大多為中學學生。1935 年，合歡越已成為了「高嶺深谷徒步健行的代表」（沼井鐵太郎，1997：233）。而早在合歡越道路完成之前，民間即有積極推動太魯閣成為國立公園的構想，在「東臺灣勝地宣傳協會」的大力鼓吹之下，及日本林學博士田村剛的考察，並在花蓮港廳的積極請願之下，也使得太魯閣在「合歡越」完工的這一年，入選

¹⁷ 關於合歡越的歷史與沿革，請參閱楊南郡（1988；1990）。

成為國立公園候補地。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台灣也隨即進入戰時體制；而這一年11月，總督府臺灣國立公園委員會也正式指定了醞釀已久的「大屯」、「次高大タロコ¹⁸」、「新高阿里山」三個國立公園。次年（1938）隨著戰爭的日益加劇，隨即頒佈了「國家總動員法」，將舉國國力投入戰爭的需要。而業已展開的「皇民化」運動，除了精神意志上透過時局意識的灌輸，並要求國民承擔應有的臣民義務；也包括了強調對於身體的鍊成，即對於「國民體位向上」的要求；以應此一非常時期的國家動員需要。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青年學子的登山成為了戰爭動員下受到鼓勵的運動。臺中州知事松岡一衛，在其國立公園成立的文章中，便有針對青少年們利用自然、並預作未來準備的期待訓勉：

在此一內外遭逢重大時局之下，國立公園提供了背負著日本躍進的青少年們，一個積極磨鍊修養與克服困難的身心陶冶之神聖道場，為國家非常時刻的將來而預作準備（松岡一衛，1938）。

「次高大タロコ國立公園」，為當時全台最大的國立公園，園區除綜合了次高山（雪山）、合歡山、大霸尖山等名山外；更結合太魯閣峽谷、三棧溪流域、與木瓜溪流域的廣闊區域。整座園區便是以合歡山為中心、以「合歡越」為貫穿園區動線的高山型國立公園。欲親近此一天然美景的唯一方式，在當時也僅有登山一途；合歡山與合歡越因而成為青年學子的熱門登山路線。此一時期的合歡山，由於登山目的已由探險轉變為探勝，再至此刻的國民鍊成；因著合歡越的開鑿完工、已無「蕃害」的山林、以及國家非常時期的動員驅使氛圍之下，使得台灣的登山活動同時發生了巨大的，量與質的轉變。

臺灣山岳型態國立公園所提供的高山環境，將如何結合青少年學子的身體與意志鍊成，並與國家的期待一致？我們可以攀登合歡山的過程為例，簡單的從幾個特徵來認識。其一、以戰時動員的需要為依歸，登山活動的過程，即是一種準軍事化的身體的鍊成。強調精神與意志的堅持與磨練；身體的鍛鍊與體能；在特殊環境下的野外自保與求生；更有著與軍人類似的個人裝備（諸如一致的服飾、綁腿、背包、地下足袋¹⁹、風雨衣）要求。其二、是思想的規訓。日治時期三個世代的歷史記憶：明治年間的「深堀事件」、大正年間的「太魯閣討伐」、昭和年間的「霧社事件」，使得攀登合歡山的登山過程中，充滿了豐富的歷史意義，沿途經歷史蹟，並得以思考前人堅苦卓絕的精神。其三、是身體馴化的象徵。自合歡山的軍事首登，至日治末年登山團體的絡繹於途；登山的過程與行程大抵有行前神社祈福、固定的路線階段（合目）、宿泊所，與登頂儀式（三唱萬歲、遙拜皇宮）；從佐久間總督下至青年學子皆然。整個強調鍛鍊精神的學生團體登山過程中，沒有自由不羈的個人主義，一切均講求紀律與團隊的意志。

而在登山者的集體記憶中，台灣山地歷經了「獐猛蕃人」的盤踞、理蕃討伐

¹⁸ 即是目前的太魯閣國家公園、與雪霸國家公園。

¹⁹ 日式的工作鞋。

戰爭；在凝視異文化的好奇心態之下，參觀諸如霧社、或沿途蕃人的生活方式，同樣成為登山過程中經常有的過渡儀式。在國家戰爭總動員後的艱困年代中，社會民間早已逐漸收拾起昇平時期的各式型態的個人享樂與活動，然而別具殖民教育意義與符合國家政策的登山活動卻持續的受到鼓勵。登山會每年仍在向來是最熱門路線與登山代表地點的合歡山區，規劃舉辦固定的登山活動（沼井鐵太郎，1997：255、263）；甚至於戰爭已進入第三年後的 1940 年間，仍舉辦慶祝皇紀 2600 年的紀念登山活動，其中也仍然持續著合歡越嶺隊伍（沼井鐵太郎，1997：297）的活動。綜觀日治時期的學生登山活動，國家政權利用登山的過程中，消弭差異、創造一體感；營造出有助於社會控制，使學生呈現服從與集體性；以支配意志，達到同化的目標（林玫君，2003：191）。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隨著短暫的勝利後，日軍開始在各戰場上漸露敗象，隨之節節敗退；不能倖免的台灣本島，也開始遭受戰火波及與重創。合歡山區的登山攬勝，才隨台灣各地的登山旅遊活動，一齊進入停滯的蕭條時期。直到 1945 年，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結束了日本政府 50 年的治台歷史；而日治時期合歡山區蓬勃的登山活動，也有如曇花一現般，約只維持了十年光景。

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政，而遠在中國的內戰卻值如火如荼之際，隨後的數年間，政局也發生了重大逆轉；1949 年，戰事失利的國民政府，喪失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數百萬軍民隨政府跨海來台。渡台後的國民政府，在「固守台澎金馬，伺機反攻大陸」的戰略指導下，鑑於國防軍事的需要，而有倡建構築貫通臺灣的橫貫公路之議。負責籌畫橫貫公路的臺灣省公路局，選定多處參考路線進行評估，並於 1956 年 7 月開始，沿用「合歡越」廢道，進行「東西橫貫公路」的開鑿工程。

「東西橫貫公路」的興建，其主要考量不僅為國防與經濟之需要，其中也包含了為安置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量退伍軍人、及延續一貫的開發山地資源等多重考量。1956 年 7 月，數以千計的榮民、官兵被投入此項浩大工程；並在 1960 年 4 月，耗資了四億、歷時 3 年 10 個月，開闢主線總長 192 公里的「東西橫貫公路」方告竣工。「東西橫貫公路」的竣工，不僅貫通了中央山脈的天然屏障，也將合歡山與平地社會拉近到了僅僅半日的距離，使得歷覽合歡山與甚至太魯閣的美景，不再僅是登山者專屬的權利。然而，如同日治時期的山林探測一般；隨著地理空間的拓展，新的文化意識也藉著交通之便，滲透進入了山林。

此一時期，沿線的地理命名在此整批的改弦易調，中國歷代的地名、人名與道統；如廬山、昆陽、大禹嶺、天祥、文山、仁愛、信義等象徵符號，大量覆蓋在原有地景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國意識的、新的文化地景。地理更名所企圖強調的，仍是表現國民政府繼承一脈道統的合法性身份，並強調國家與民族身份認同的意識。而就在橫貫公路通車的這一年，蔣介石總統親臨巡視之際，合歡山也被有心逢迎者改名，而被更換了「介壽山」的新名稱；藉由合歡山高山的地理特性與象徵，而賦予地景成為頌揚統治者的、新的政治符號。在政府的正式文件及地圖上，也陸續逐一更換上「介壽山」這個新名字（行政院新聞局，2001；劉枝萬

等，1989)。

如同前述日治時期「國家總動員法」下的青年學子，在國民鍊成的要求下而被鼓勵的登山運動，因而將「高山」作爲了身心的修道場；後繼的國民政府也在「動員戡亂時期」下，運用救國團的青年自強活動，同樣也將此間山野，進行青年學子的身體規訓。

1952 年，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局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蔣介石在對於救國團成立的訓詞中，要求救國團的性質應建立在：與國家教育文化政策密切配合、鍛鍊堅強體魄、陶鑄文武合一的人才的「教育性」；以學校青年爲基本，提高互助合作精神、服從團體命令、嚴守革命紀律，以便發揮組織力量 獲得工作成效的「群眾性」；以及學習戰鬥技能、勵行勞動生活、發揮勇於負責的戰鬥精神的「戰鬥性」之上（賈嵩麓，1974：300-2）。救國團綜合了在中國大陸面對大批學潮，而喪失青年的信任與參與，以及淪喪政權的教訓；因而在此以「教育」、「群眾」，與「戰鬥」的性質之上聚焦。藉由舉辦青年活動，拉近與青年的距離，是其操作的策略；也因此每年寒暑假「青年活動」的舉辦，成爲了救國團的一項特色。

創辦前期的救國團「青年活動」以戰鬥訓練活動爲主；1961 年後逐漸加入綜合性的青年活動；至 1972 年退出聯合國後，則改變活動型態爲「青年自強活動」重新恢復戰鬥及體能的軍事化活動（黃金麟，2009：149）。在各個階段的青年活動中，合歡山也因橫貫公路開通之便，與冬季易於積雪的特性，成爲了大受歡迎的熱門營隊之一。除了地處亞熱帶、且尚未開放出國觀光的青年學子對於白雪地景的嚮往；另一方面，自 1960 年後改隸教育部後的救國團，也逐一於橫貫公路乃至於合歡山區交通沿線設立許多山莊，乃至於協調軍方動員的人物力支援，提供了冬季雪期高山地區活動必要的便利條件，皆使得合歡山具備了野外活動營隊所需的良好條件。

而在不同世代下的合歡山登山活動，日本青年學子偏好「夏季登山」（沼井鐵太郎，1997：77、98）從事國民的身心鍊成，而救國團活動設計則更偏好以傲雪凌霜的「冬令活動」中，在於風雪中體現「自強」的活動旨趣。偏好不同，也可看出文化背景的差異，與社會脈絡的不同。從 1953 年至 1975 年間，各期「青年活動」中，關於合歡山的活動，種類極其多元，共計有：「合歡山戰鬥營」、「合歡山滑雪營」、「合歡山雪地活動隊」、「合歡山冬令營」、「合歡山夏令營」、「合歡山賞雪團」、「合歡山攝影健行隊」、「合歡山健行隊」等營隊；而利用此周邊山區的活動隊伍則還有「東西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東西橫貫公路健行隊」等（陳耀宏、蔡禎雄，1993：34-35）。

在活動的進行中，除了以團康活動營造「自強」、「團結」等情境的體認與想像；救國團也將政治與軍事的思想教育，寓於活動設計之中，達到國家規訓的目的，而這也是舉辦青年自強活動的宗旨。例如在活動中集合團員於廣場舉行檢閱典禮，並透過集體演講，加強學生們的愛國教育理念（陳忠慶，1980：107）。而在生活作息上，無論梯隊的性質是否爲「戰鬥營」，抑或其他的教育營、文藝營、

自強營隊等；均必須接受軍事化的生活管理；使得軍事化的管教成為救國團的特色。而這也使得救國團成為了軍隊以外，最有戰鬥氣息的團體（黃金麟，2009：150）。而在合歡山的另一隅，主、東峰之間，合歡谷內的陸軍寒訓基地，也同時在冬雪季展開雪地特戰訓練；使得整座合歡山上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軍事操練的活動。

合歡山一如千萬年來的春陽冬雪、四季輪轉；然而此時的皚然白雪之上，卻是交織呈現著一幅在風雪飄搖中，軍民同心、歲寒自強的文化地景。在更迭的世代、卻是相同的空間之上，不同的國家權力皆然在此凝視、規訓著每一個溫馴的身體、並建構要求順從的意識理念。內化著權力的身體，就如同風景圖片上的合歡山積雪地景般，不容一絲瑕玷。

「反共復國」、山頂發聲——戒嚴的文化地景

1914 年的太魯閣武裝侵略軍事行動，其影響不僅僅為太魯閣原住民傳統與文化的破壞，其間的諸多科學技術與考量，也為日後合歡山乃至太魯閣山區的地景，產生延續至今日的諸多影響，諸如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稱、中橫公路開鑿路線的選擇，與合歡山頂的空間利用思維。

當日軍將軍事行動指揮的大本營推進於合歡山，並設置軍需倉儲庫後；便基於合歡山的山勢獨立、且立於中央山脈高達 3416 公尺的無阻礙高度，使得日軍在太魯閣戰爭時期，選定了合歡山山頂，斥資經費一萬日圓，由山本、尾原兩名總督府技師架設長距離通訊天線，完成了「合歡山無線電信所」的設置；負責每日與花蓮港廳的米崙山電信站交換電報（遠藤克己，1914）。這是文明產物頭一遭地，佔據了合歡山的山頂；也展開了文明技術對於此一地理空間的充分利用。

東西橫貫公路開通之際，這個時期的台海之間，仍處於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危機之中，國共間也加強展開各種型態的心理戰爭；其中的宣傳戰戰火，也在台灣海峽上相互隔空交鋒。台灣為了反制中國大陸不斷滲透的心戰廣播，於是在 1951 年開始進行整平合歡山頂、興建機房屋舍，由黨營的中國廣播公司，運用美援器材架設長程廣播天線；在山頂上構築了「合歡山轉播站」（中國廣播公司，1998：135），從事對中國大陸軍民的心戰廣播。

選擇合歡山主峰的原因，除了沿用了日人自太魯閣討伐戰爭中，選定合歡山主峰頂架設通訊設施的相同理由，即為：高達三千四百餘公尺的海拔高度、峰頂平緩寬闊的主要條件之外、更由於橫貫公路興建後，造就了便於交通與補給的最佳有利條件；此後，合歡山主峰頂成為了軍事重地。而在當時的國家廣電政策下，對外部分，除了最主要的遮蓋大陸心戰「匪波」滲透、以及對國際宣傳團結海外僑胞之外；對內，也更要求鞏固心防，希望民眾服膺政府領導、消弭異音（何貽謀，1992：23）。

這個「遏制匪波」的責任，成了各黨營、軍營主要廣播電台的首要任務。海峽兩岸除了需要不斷的移動頻率，更要以強大功率互相壓制對方；「合歡山轉播

站」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運作。1962 年 9 月，在當時黨政軍一體的時代，由國防部、台電、中廣、民航局與退輔會等單位，共同斥資了千萬經費，完成對位於海拔三千餘公尺主峰頂「合歡山轉播站」電力輸送的浩大工程，以達到 24 小時全日開機運作的能力（中國廣播公司，1998：144）。至此，其不僅成為台灣最高海拔的廣播轉播站，得以將功率發揮至極致；並且無論日夜的，在全球冷戰對抗的分工下，在這高山頂上，從事著沒有砲火的戰爭。也由於山頂空間的戰略考量與軍事化利用，終於將合歡山山頂，禁錮成了一座無法親近的戒嚴空間。

1970 年代，國內興起一股攀登「台灣百岳」的登山風潮，使得許多的山峰，成為登山者追逐的夢想；因而往來於各個山地管制區之間。所謂的「百岳」，意指著由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挑選出公認足具代表性的百座名峰，作為登山者的榮譽目標。合歡山以其獨具的地理特性、高知名度與歷史意義，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百岳」的一員，但卻也是唯一遭軍事管制山頂的百岳成員。因此，早期的登山者只能受拒於營門外，不得其門而入。而山頂的駐軍，與始終禁閉的神秘軍事設施，使得合歡山頂突兀於中央山脈的天際線上；不但不為社會所悉，而總是給予外界神秘而又森嚴的印象。

直到 1980 年代晚期，台灣民主意識帶動了一連串政治的開放措施，使得兩岸關係漸趨和緩，並隨著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成立、及國民逐漸重視休閒旅遊的趨勢下，絡繹不絕的遊客湧進合歡山區，假日、雪季期間更顯水洩不通。無論是夏季的青青草原、或冬季的皚皚雪坡；遊客的歡笑聲，散佈在這座高山上的每個角落。而合歡山頂的戒嚴禁地，也在這段期間不知不覺地逐漸撤廢，終至傾圮。棄守的電台、營地、與鏽蝕的廣播天線，散佈於空蕩蕩的山頂上，在落日餘暉下獨顯淒涼。在這絕頂之上，歷史的章頁俯拾即是。

蓬瀛仙山、人間宿命——結語

從小小的合歡山頂上，卻也足以窺見台灣數百年的大時代變遷。每一段歷史恰如雪泥鴻爪，也都在這裡刻畫下了些許活動的痕跡。清代為之簡略勾勒、作志傳世，使得文獻中的合歡山至今依然虛無飄渺；地理測量技師將之命定「確立」，宣告了空間殖民的開端；由此蔓延的侵略戰火，成為太魯閣族人的殖民記憶根源；青年救國的松雪礪節，仍是當代社會的集體記憶；山頂上的電台禁地，見證著一段逐漸遠去的「反共復國」激情年代；幾教世人遺忘的「介壽山」之名，代表著一段威權神話的破滅；而空間的解嚴，則使我們得以有機會實踐、並企盼人與自然和諧的時代來臨。

我們嘗試著援引 1925 年美國的地理學者 Sauer 所提出的「文化地景」（landscape）一詞，來作為合歡山這個地景的解析基礎。他指出了文化地景是由文化團體改變了自然地景而來；文化是原動力，以自然地域為媒介物，而文化地景則是結果。隨著外來的文化到來，文化地景將獲致新的活力；抑或此一新的文化地景將會覆蓋在先前舊有的文化地景之上（Sauer, 1925）。Sauer 的論述，乃是

針對了當時地理學界「環境決定論」的主流所提出的批判；一如數百年來「自然」與「社會」的科學二元對立，他指出了 *nature* 與 *culture* 並非兩個對立的概念，而是相互交織與影響的過程。換言之，看似無辜客觀的自然景觀，其實仍深受刻意主觀的文化作為所影響，進而形成了文化地景；並且隨著文化的更迭，文化地景亦將隨之變遷。

這正是合歡山三百餘年間的真實寫照。文化利用地理的方式，賦予某些空間特定意義（Crang, 2005: 40）；自清代以來的一個迷樣空間被「再現」之後，合歡山就注定與山下的一切交織糾結，以及不斷的被文化作為加諸於其身。數百年來，山下世界的一切，不斷地投射在這座 3416 公尺的高山之上。如同地景都是變遷的記載；當文化價值有所變化，隨之需要新的地景形式（Crang, 2005: 28）。經歷了殖民統治、威權統治，在山頂之上，這樣的社會建構隨著朝代的更迭，不斷的在山頂上「再生產」出新的文化意涵；因而在美麗的自然地景背後，合歡山卻也正是一面文化的視窗。它豐富地展現了從清代、日治、乃至於當代的山下社會中，關於文化、社會與權力的變遷關係。藉由合歡山所呈現的不同社會意涵，使我們得以看見各種文化在這個美麗地景上所留下的集體記憶、國家權力、社會意志與意識型態的種種刻鑿痕跡。

恰如社會與空間不可分離，空間與社會相互鑲嵌影響的基本命題；地景是一個社會空間，而「山」則是個最能具體表現文化意涵、與權力象徵的實踐符號。文明高山的特性、與種種偶然的歷史條件，終究造就合歡山成為一個文明與自然交會之下，「文化地景」的必然宿命。

後記

廿餘年前，無意間的一趟合歡古道登山之行，
讓我初次拜讀了楊先生的古道作品；
景慕之餘，也踏入了這古道的探查行列。

日後，得以有幸跟隨於先生的「古道學」研究；
猶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得以略窺山林中每個角落的歷史、族群、民俗、社會與政治之奧衍；
從而遨遊在台灣山林與歷史古道的無盡知識間。

當於此浩瀚的學海中從師相隨，
在淵博的古道鴻儒背影下、悠遊「合歡」了十餘載之後，
才知道先生的江海之學，猶如高山仰止；
雖何其惋惜未能穿過時光，重返歷史以窺清這豐富殿堂的全貌；
卻也何其有幸，就教這位承先啓後、將山林作為畢生志業的當代學術哲匠。

僅忝以此文、重返筆者與老師首次相遇的「合歡」出發，以為紀念；
並衷心感謝先生的啓蒙、引領，還有那亦師亦友般地，一路的關照提攜。

參考文獻

- Anderson, Benedict. (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
- Crang, Mike.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5。《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台北：巨流。
- Sauer, Carl. 1925.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 中國廣播公司。1998。《中廣七十年大事記》。台北：廣播月刊社。
- 六十七、范咸纂修。1989 (1745)。《重修臺灣府志》。台北：成文。
- 王幼華。2006。〈合番或者合歡〉《臺灣史料研究》27號，頁57-75。
- 伊能嘉矩。1909。《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
- 行政院新聞局。2001。《中華民國年鑑》
(<http://www.gio.gov.tw/info/90roc/contents/main.htm>) (2010/09/30)。
- 何貽謀。1992。《廣播與電視》。台北：三民書局。
- 沈茂蔭。1993。《苗栗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卓肇昌。1989。〈臺灣形勝賦〉收於王瑛曾(編)《重修鳳山縣志》。台北：成文。
- 周鍾瑄。1983 (1717)。《諸羅縣志》。台北：成文。
- 林玫君。2003。《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博士論文。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 松岡一衛。1938。〈臺灣に於ける國立公園指定を前にして〉《國立公園》10卷，1號，頁13-14。
- 沼井鐵太郎(吳永華譯)。1997。《台灣登山小史》。台北：晨星。
- 洪英聖。2002。《畫說乾隆臺灣輿圖》。台北：聯經。
- 孫元衡。1958。《赤嵌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野呂寧。1910。〈踏查合歡山〉《臺灣時報漢文版》。3月13日。
- 陳忠慶。1980。《假期青年自強活動對大學生政治態度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
- 陳培桂。1989。《淡水廳志》。台北：成文。
- 陳壽祺。1960。《福建通志臺灣府》。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陳夢林。1992。〈諸羅外紀〉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下)》。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 陳耀宏、蔡禎雄。1993。〈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全國性動態青年活動之歷史變遷〉《體育學報》15輯，頁27-46。
- 無作者。1993。《新竹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黃叔璥。1989。《臺海使槎錄》。台北：成文。
- 黃金麟。2009。《戰爭身體現代性》。台北：聯經。

- 楊南郡。1988。《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越嶺古道調查與整修研究報告》。花蓮：太魯閣國家管理處。
- 楊南郡。1990。《太魯閣國家公園合歡古道西段調查與步道規劃報告》。花蓮：太魯閣國家管理處。
- 楊南郡。2002。《台灣百年花火》。台北：玉山社。
- 賈嵩麓。1974。《總統革命思想》。台北：黎明文化。
- 臺灣日日新報。1910a。〈合歡山已竣測〉《臺灣日日新報》。3月24日。
- 臺灣日日新報。1910b。〈紀第二次合歡山測丈情形〉《臺灣日日新報》。3月27日。
-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1997a。《理蕃志稿》（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1997b。《理蕃志稿》（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上卷）。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 遠藤克己。1914。《大正三年討伐軍隊記念寫真帖》。臺北城：遠藤寫真館。
- 劉枝萬、石璋如。1989。《南投縣志稿》。台北：成文。
- 蔣毓英。1993。《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